doi:10.3969/j.issn.1003-5559.2021.11.019

我国纺织服装企业对“一带一路”国家对外直接投资区位选择探析

■ 胡 渊 蔡思琳 汤淑芬 湖北工业大学

摘 要:在“一带一路”倡议下,我国纺织服装企业加快了国际化进程。本文首先介绍我国纺织服装企业对“一带一路”国家对外直接投资区位选择现状,接着分析了我国纺织服装企业投资“一带一路”国家的动因,在此基础上探讨我国纺织服装企业对“一带一路”国家对外直接投资区位选择的影响因素,并提出我国纺织服装企业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对外直接投资区位选择的政策建议。

关键词:“一带一路”;纺织服装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区位选择

自2013年“一带一路”倡议提出以来,我国纺织服装企业不断加快“走出去”的步伐,积极参与国际投资合作,提高企业国际化水平。2013年至2018年我国纺织服装业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累计对外直接投资(Outflow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OFDI)金额达64.96亿美元,约占同期行业对全球OFDI总额的80%以上,纺织服装业已成为“一带一路”倡议的先导和示范性的产业。由于纺织服装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动机不同,“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要素禀赋及发展程度等也存在差异,故企业在对沿线国家进行OFDI时,往往面临区位选择的问题。现有文献主要从国家层面分析我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OFDI的影响因素,在纺织服装企业层面的区位选择研究较少。本文拟研究中国纺织服装企业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OFDI的区位选择问题,为纺织服装企业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对外直接投资决策提供帮助,进一步提高企业投资成功率和国际竞争力。

一、我国纺织服装企业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OFDI区位选择现状

中国纺织服装产业在全球供应链中居于中心地位,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OFDI逐步发展。“一带一路”沿线65个国家,其成员来自东盟、亚洲、欧洲、非洲,我国纺织服装企业投资国别地区覆盖范围较广。如表1所示,2000年至2020年间,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中,我国纺织服装企业OFDI主要分布在缅甸、越南、柬埔寨等生产要素丰裕的东南亚国家。与此同时,我国纺织服装企业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投资过程中,面临着投资环境不稳定、激烈的文化冲突、产业链不完善、高端技术人才紧缺等问题,如何进行区位选择以保证投资活动的顺利进行值得探讨。

表1 2000年-2020年我国纺织服装企业对“一带一路”国家OFDI区位选择

国家	缅甸	越南	柬埔寨	孟加拉	印度	乌兹别克斯坦	埃及
OFDI次数	46	45	35	16	12	10	6
国家	新加坡	印度尼西亚	土耳其	马来西亚	巴基斯坦	阿拉伯联合酋长国	塔吉克斯坦
OFDI次数	5	4	4	4	4	4	3

数据来源:笔者根据商务部对外直接投资企业名录自行整理

[基金项目]本文系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一般项目“异质性出口经验与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动态:理论机制和中国经验”(18YJA790035),大学生创新创业项目“出口经验对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决策的影响研究”(S202110500 081)的成果。

[作者简介]胡渊(1980—),女,经济学博士,湖北工业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副教授;研究方向:国际贸易理论与政策。蔡思琳(2000—),女,湖北工业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研究方向:国际贸易。汤淑芬(2001—),女,湖北工业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研究方向:国际贸易。

二、我国纺织服装企业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 OFDI 的动因

(一)政策支持

纺织产业是“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推进工业化发展、创造国民财富以及提供大量就业的民生产业。沿线国家出台的政策也为我国纺织服装企业对外直接投资营造了有利的投资环境。在“一带一路”建设推动下，我国与沿线国家签订多条互惠合作协议，为中国纺织服装企业“走出去”，在全球范围内优化资源配置，实现高质量发展带来了机遇和动力。2012 年缅甸制定《外国投资法》，出台了纺织服装行业的投资细则，鼓励外资投资缅甸纺织服装业。越来越多的中国纺织服装企业在缅甸投资设厂，以期抓住缅甸的投资红利窗口期。孟加拉是世界第二大服装出口国，约有 400 家纺纱厂、800 家纺织企业和 3600 家成衣企业，超过 440 万工人，主要成衣出口产品为裤子和 T 恤，成衣出口额约占全国出口总额的 80%，美国和欧盟是孟加拉成衣最主要出口市场。孟加拉对所有纺织品服装企业所得税税率削减至 12%，针对纺织服装出口额外给予 4%的现金补贴返还，并且在出口加工区(Export Processing Zone，EPZ)的企业进一步享受税费优惠及减免。

(二)市场寻求

据邓宁的国际生产折衷理论，东道国的市场潜力是影响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重要因素。 据统计，“一带一路” 沿线 65 个国家，2019 年总人口超过 44 亿，占全球总人口的 63%，GDP 总量约 21 万亿美元，约占全球 GDP 的 30%，是极具潜力的重要新兴市场。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中，东南亚、南亚、东欧等地拥有较大规模的纺织服装产业，是欧美地区纺织服装的主要贸易伙伴，纺织品出口量位居世界前列，拥有广阔的国内外市场。比如，罗马尼亚是东欧传统纺织服装业强国，生产方式以来料加工为主，产品能免关税进入欧盟市场和与欧盟达成自贸协定的国家。如果中国纺织服装企业在罗马尼亚投资建厂，既可以获得罗马尼亚的优惠政策支持，又可以免关税出口到欧盟国家。总而言之，“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广阔的国内外市场为纺织服装企业提供了源源不断的发展动力。

(三)成本导向

纺织服装业属于制造业范畴，对劳动力、原材料依赖程度高。近年来，随着我国经济水平提高，发展不断加快，人口红利逐步消失，国内劳动力成本上升，进行产业转型升级势不可挡。“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以发展中国家为主体，部分国家经济发展较为缓慢，劳动力充足且成本低，要素成本较为低廉。据统计，我国用工成本比东南亚国家高出 1～3 倍，用棉成本高 30%以上，用工难、原料价格高的问题普遍存在。为了追求更高的经济利益，加大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 OFDI 成为必然选择。恒田(仰光)制衣有限公司 2014 年在缅甸落地，利用当地低廉的用工成本与政策支持，把握住缅甸投资的黄金时期，促使当地服装生产规模逐年增长。我国纺织服装企业通过对外投资建厂，充分利用相关国家的要素禀赋，进行垂直产业链整合，引导国内的纺织制造产业向高端转移，有利于增强企业国际竞争力。

三、我国纺织服装企业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 OFDI 区位选择的影响因素

“一带一路”建设的不断推进为我国纺织服装企业国际化战略提供了重要的发展机遇，政策倾斜、市场庞大和成本优势等吸引我国纺织服装企业逐渐加大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投资。当企业通过对外直接投资融入全球经济时，战略定位、投资回报等要求企业必须重视区位选择的问题。

(一)政治环境稳定性

东道国的政治环境稳定性直接反映了该国的经济发展水平和法制水平。稳定的政治环境会降低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融资风险、交易成本、投资活动的不确定性，有利于扩大企业对外投资规模、促进投资方式多元化以及提高对外投资的成功率。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中，叙利亚、伊朗等政治环境较差，甚至存在暴力冲突、战乱、工人罢工等不稳定的因素，会给在建或拟建的项目带来严重负面影响，波及企业经济效益，从而影响企业在当地的投资决策。因此，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中国在对外直接投资时应优化考虑政治环境稳定的国家。

(二)经济发达程度

东道国经济发达程度与投资活动的发展息息相关。东道国经济发达程度越高，意味着其拥有更好的基础设施、更高的标准化程度、更成熟的资本市场，这为在该国从事 OFDI 的企业提供了保障。2016

年启动的中国埃及苏伊士经贸合作区，目前拓展区已完成2平方公里的基础设施建设，吸引了8家行业领军企业，协议投资额2亿美元，餐厅、酒店等基础设施建设完备。“一带一路”沿线本身就是个巨大市场，2018年沿线各经济体之间的贸易额占到了全球贸易总额的13.5%，逐渐成为全球贸易体系中的重要一极。然而“一带一路”沿线各国绝大多数是发展中国家和新兴经济体，各国经济发展水平不同，影响贸易投资便利化的最大障碍是沿线各国的基础设施建设滞后及制度环境落后。在同等条件下，中国纺织服装企业在投资时，应该优先考虑经济发达程度高的国家。

（三）资源丰裕程度

东道国资源的丰裕度直接影响了中国纺织服装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区位选择。中国纺织服装企业发展程度不同，对外直接投资动机也不同。对于发展程度较低的企业，没有足够的资金实现生产机械化，其需要低廉的劳动力降低生产成本，以谋取更多的利润。因此，发展程度较低的企业会更多考虑劳动力成本因素，其更适合在柬埔寨、印度等劳动力资源丰富的国家投资；而对于发展程度较高的企业，其基本实现生产现代化，劳动力成本对其发展影响不大，其战略目标是创新、打造国际品牌，因而需要人才、技术为其发展作支撑，其更适合在新加坡等国投资。总之，我国纺织服装企业在对外直接投资时，应依据战略目标，选择不同资源禀赋的国家作为投资对象。

（四）制度距离远近

制度距离分为正式制度距离和非正式制度距离，前者代表两国在政治制度等方面的差异，后者代表两国在文化、道德等方面的差异。制度距离主要通过两种途径影响纺织服装企业在“一带一路”沿线OFDI的区位选择。第一种是制度接近论，双边国家制度距离越接近，越有利于资源的自由流动和优化配置，减少外来者劣势成本，因而纺织服装企业会选择与母国制度距离较小的东道国进行投资。第二种是制度逃逸论，由于发展中国家普遍制度质量不高，因而东道国完备的制度建设、健全的产权保护体系等能够降低对外直接投资的风险及不确定性，因此双边国家制度距离越大，越有利于对外直接投资。作为转型中的发展中国家，制度距离对我国纺织服装企业在“一带一路”的OFDI区位选择的影响，表现出如下“二元路径”特点：即一方面倾向到制度距离接近的发达国家投资，另一方面倾向到制度距离差距大的发展中国家投资。

四、我国纺织服装企业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OFDI区位选择的策略建议

纺织服装企业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进行OFDI区位决策时，既要充分考虑东道国的投资环境、制度环境，也要充分利用东道国在市场、技术、要素禀赋等方面的特征，推动产业升级，提升在全球产业链中的位置。

（一）调查投资环境，提高风险抵御能力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存在着政治风险、法律风险、能源安全、自然灾害等安全问题。不管战争暴乱还是政局更迭，不管是全球性疾病如新冠疫情还是项目延期等引发的违约风险，都加大了我国纺织服装企业的投资成本与经营风险。据《中国海外投资国家风险评级报告（2021）》显示，“一带一路”沿线大多数国家属于中等风险级别，其对华关系得分显著高于平均水平。因此，我国在进行投资布局之前应对相应的国家进行实地考察，搜集政策限制、市场调研、民意分析、营商环境、合作伙伴资信情况等内容，进行数据分析与对比，充分估计投资过程中可能出现的争议，吸收借鉴投资的失败教训，避免盲目投资。为此，企业在对外直接投资之前，有必要建立综合性风险评估体系，做好抵御、防范风险的最后一道屏障。

（二）结合投资动机，优化资源配置

我国纺织服装企业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进行对外直接投资时，应该结合企业经营战略和OFDI动因，因地制宜考虑东道国的资源丰裕程度、市场大小等因素。对于原料寻求型OFDI，企业在进行区位选择时，应加大对资源丰裕国家的投资，可扩大原料生产基地，降低原料成本，确保棉种、纺纱、染料等的源头供应稳定。对于成本导向型OFDI，企业可重点关注如柬埔寨、缅甸等人力资源丰富的国家，当地劳动力资源廉价且充裕，借此促进我国纺织服装企业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经济发达程度较高、政局稳定的国家给研发与营销环节带来了完备的基础设施、广阔的经济腹地、优惠的政策支持等，加大对于沿线发达国家的投资，利用当地高端技术人才与技术条件，有助于

降低研发成本;利用区域自由贸易协定规避贸易壁垒,将产品销售到欧美地区，拓展全球销售网络,进一步形成产业链价值链协调互动的格局，占据价值链的高端环节，实现全球纺织工业布局与转型升级。

（三）考虑制度距离,选择合适东道国

“一带一路”沿线幅员辽阔，其中制度质量较差的国家居多，纺织服装企业在对其投资过程中可能会遇到一些制度障碍,需充分考虑制度距离对其区位选择的影响。纺织服装企业在进行区位选择时,应该遵循“正向制度距离越小,负向制度距离越大”原则。当选择在“一带一路”制度质量强国进行 OFDI 时,纺织服装企业应选择在与中国制度距离接近的国家进行 OFDI，以期降低制度壁垒对 OFDI 的影响。当选择在“一带一路”制度质量弱国进行 OFDI 时，纺织服装企业应选择在与中国制度距离较大的国家进行 OFDI,充分发挥我国纺织服装企业的竞争优势，统筹利用东道国的自然资源与市场规模优势。通过评估与权衡投资动机、投资回报率、双边的制度距离等，纺织服装企业应妥善选择东道国，提高对外直接投资区位选址的有效性。▲

注释：

①数据来源：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数据 http://ccpithz.huzhou.gov.cn/czzz/zhdt/20191217/i2570484.html.

参考文献：

[1]盛宝魁.加快我国纺织服装业对外直接投资问题的研究[J].天津工业大学学报,2008(1):84-88.

[2]任媛媛.当前我国纺织服装对外贸易发展的新趋势与提升路径[J]. 对外经贸实务,2018(7):49-52.

[3]许欣.“一带一路”背景下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风险及对策分析[J].改革与开放,2020(13):19-23.

[4]许唯聪.制度差异对中国 OFDI 空间布局的影响——基于双重差分空间滞后模型的分析[J].经济经纬,2021(3):44-54.

[5]杨瑞瑞,刘永旺,古丽娜尔·玉素甫.“一带一路”倡议下中国制造业 OFDI 的区位选择[J].统计与决策,2020(7):99-102.

[6]周杰琦,夏南新.“一带一路”国家投资便利化对中国 OFDI 的影响[J].亚太经济,2021(5):82-94.

(上接第 81 页)

规避体育产业投资面临的争端风险。第一,适当调整体育文化条约。国务院早在《关于加快发展体育产业促进体育消费的若干意见》中强调:“充分发挥体育产业间的互动作用，推进各产业与业态全面协调发展”。因此,针对中国优势体育文化产业,政府应积极参与 WTO 谈判,保留相关产业投资份额；针对其他体育文化产业，政府可适当接受对应的“例外”条约,以推进整体体育产业协调发展。第二,善用国际仲裁方式,保障投资理性。针对体育海外投资资产转移问题，中国企业在投资时,应与投资企业协商,将海外投资合同准据法选定为第三方国家或地区的法律,增强投资中立性,避免资产转移这一认定不统一问题。

（五）采用差异化全球适应主张

数字经济高速发展重构了全球产业链发展格局，为全球产业提供差异化选择，使得国内外产业经营存在异同性。这一过程中,企业数字化运作形成的数字经营方式，为全球适应主张提供新契机。因此,针对资源整合风险，体育产业应采用差异化全球适应主张，最大化降低跨国资源整合风险。具体来看,中国体育产业在完成海外投资时，应在合法合规前提下,处理当地政府、地方势力与社会团队之间的关系。例如,在欧美等工会团体较为强势的国家,企业在开展并购之前,需经过工会批注,主动与工会组织协商,征求其有关于劳工安排的意见，为企业融入当地投资环境助力。而针对企业运营方面，应尽量保留核心人才团队，通过董事会审计与风险委员会,制约各经营层权利,监督经营层运营,以实现对投资企业管控。▲

参考文献：

[1]河北新闻网.赋能体育产业高质量发展“2021 中国数字体育发展高峰论坛”成功举办[EB/OL].https://baijiahao.baidu.com/s?id=1710256867047049083&wfr=spider&for=pc.[2021-09-07].

[2]赵丽敏,刘鹏.中国企业并购欧洲足球俱乐部的动机与策略分析[J]. 对外经贸实务,2017(2):77-80.

[3]黄世席,范璐晶.中国海外体育产业投资的风险防范与争端解决[J].上海体育学院学报,2020(6):1-11.

[4]南音.我国资本跨国并购体育产业资源问题研究[J].体育文化导刊,2017(11):106-110.